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

曾永成 著

人民出版社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

曾永成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曾永成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ISBN 7-01-005459-2

I 回… II.曾… III.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研究 IV.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076 号

HUIGUI SHIJIANLUN RENLEIXUE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解读

曾永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0 千

ISBN 7-01-005459-2 定价:24.00 元

前言

返回原典文本 开拓阐释新路

人类进入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新的世纪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吗？日新月异的文艺还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吸取智慧和力量吗？如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必要，我们又应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在哪里确定继续发展的基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对长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阐释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和审视。

早在 1989 年，邓小平在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时曾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无疑，正确的认识乃是正确地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来说，就有必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其原典文本重新解读，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认识返回到这些原典文本所展示的学理内容的本身，廓清流行阐释造成的迷误和屏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流行阐释的科学超越，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阐释的新思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91 页。

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阐释也必须与时俱进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绝不是一下子就能到位的。或者由于实践目的、范围和经验的限制,或者由于既有知识造成的“前理解”的拘囿,还可能是某种心理定势或浮躁情绪作怪,也还有理论研究上的条件限制和思维盲区,都会造成视野的屏蔽和理性的歧途,影响到对原典文本的掌握和理解。这样一来,就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阐释上出现这样三种令人遗憾的情况: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并不准确甚至出现重大的误读,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低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水平;二是由于整体解读上的一些失误而造成对许多具体观点的误读或者肤浅甚至庸俗化的阐释;三是因为忽视或者不尊重原典文本中本来存在的一些基本观点,即使注意到也因其表述方式上的隔膜而与马克思之前的观点混淆起来。这种种误读和盲区,就必然由于违背某些原则性主张而造成实践中的挫折。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中国社会的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又是怎样在接踵而至的问题情境中匆匆忙忙接受、应用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还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文化的基础和前理解的制约下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到今天,从容地、全面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所包容和阐述的基本学理,充分理解其对西方现代化运动及其思潮的批判性超越精神,真切地把握其在 21 世纪的当代意义,已经具备了空前优越的条件。我们应当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只有抓住了这个机遇,也才能更有信心地去面对各种各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 challenge。

由于直接实践任务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的哲学水平的限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难免有

所侧重。比如说,人们曾经主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现在又提出了人类学的视角。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现在为不少人所热衷的存在论、生存论的内容都存在,但是这些都不是它的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地上”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实际上就是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阐释长期陷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的境地,既不符合其哲学原典的实际,更降低了它的学理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都明确肯定过自然界的“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规律,描述了作为其实践论人类学的本体论内涵的生成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综合了哲学史上出现过的除了创世论以外的所有本体论的合理因素,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加以序化整合,从而最全面也最正确地揭示了世界存在的真实。

当下的哲学界,要么用实践论思维路线代替本体论思维路线,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思维这一极其重要的内涵;要么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概括为“唯物主义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和“生存论的本体论”,而未能达到整体的和动态的认识。原典文本中的实际情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包含了上述三者,但这三者各自都不能概括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思想的整体;马克思他们是把世界的本体看作一个在自我生成中显示为不同形态的动态过程的。物质当然是它的本源,但是由于物质及依存于物质的能量和信息在运动中相互作用而一步一步地生成出新的存在形态来,于是这个本无生命的世界有了生命,有了人的实践和精神,有了从自然界的自发生成到人通过实践自觉生成的伟大飞跃。正是这一切才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面对并生活其间的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在生成本体论中,生命、人及其实践的本体地位和人类学意义才充分而深刻地显示出来,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也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它的光辉。以生成本体论为基础,以人本生态观为特色的

实践论人类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和根本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阐释,显然是返回原典文本之后才达到的对流行阐释的巨大超越。而这也才是它的视界在当代仍然不可能被整体超越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充分科学地解释包括人在其中的这个复杂的世界,帮助人们认识自我生成和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阐释也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启迪下矫正已有的误读,打开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屏蔽。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就应当在深化整体认识的同时重新学习和研究原典文本,使我们的认识更准确更全面也更深刻。只有这样,才能在其灵魂之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进,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为 21 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建设发挥应有的功能。

正如恩格斯所说,比起其他意识形态来,哲学和宗教更加远离经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系中,哲学是最不易受历史潮流动摇的部分,它的真理性具有超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巨大生命力。对此,不少学者都有共识和深刻的见解: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或者说它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为了深入认识和开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当代生活的巨大意义,哲学家们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发出了“重读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并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胎生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两者本是血脉相连、气息相通的。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也曾在“重读”和“回到”上下过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但是,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文艺学研究要么在哲学基础上仍然是在流行阐释的视界内盘桓和取舍,要么急急忙忙向别处主要是西方寻求和引进新的思想资源。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上也有一些较为重要的突破，例如实践人本学美学、人学文艺学、生存论美学和关于生态论文艺学的初步思考等，就是值得注意的思路。尽管如此，由于对哲学界的“重读”和“回到”所取得的成果关注和吸取不够，又缺少在哲学层次上的独立的探索和识见，因而在总体上依然没有更为理想的改观。现在需要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整体性重读的基础上去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对其超越现代西方文艺学和美学的意蕴进行一次深入其生命基因的探源。

毫无疑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原典文本的重新梳理、解读和阐释，特别是对其中一些被推到思维死角中的观点的重新发掘和理解，应当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按照马克思的方法重新审视原典文本

重新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原典文本，应当遵循的正是马克思告诫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规律。

在阐述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与“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规律和方法。

事物的发展总是一个从旧事物中生成新事物的过程。旧事物之所以能生成新事物，是因为旧事物中包含着新事物的征兆。然而，对这些征兆的认识，却往往要在新事物已经生成并被认识之后才能趋于正确。对生物的认识是这样，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这样；对一种理论学说的认识当然也不会例外。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会无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一种学说中已有的某些重要观点，到我们在实践中遭受挫折而总结经验教训回头看时，才发现前人已经有明确的教诲，这些教诲甚至比我们自己总结的教训更加深刻精辟。有时候，即使摔了跟头也还看不清，还要接二连三地摔跟头，则是因为我们还是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且过于固执。当社会实践的发展使我们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再来“回头看”时，我们在黑暗中的艰难摸索实在难免令人扼腕叹息，并深长思之。

一个不能回避的无情事实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遭遇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同直接实践的狭隘性相伴的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实用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个挫折，曾经一度以前无经验来予以辩解。实践本身的复杂和艰巨当然不能否认，但是，一些掌握了历史主动权的革命者轻易“超越”马克思主义，忽视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全面内容和整体精神，则应该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书以下通称《手稿》）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眼里一直是不成熟的早期著作，不仅不屑一顾，对其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还肆意大张挞伐，结果在实践中遭到历史的严厉惩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屏蔽而造成实践中严重的历史性失误的教训，我们应当严肃记取。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孕育自己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对那些曾经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马克思所批判的对私有制进行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有三种：一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二是“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三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对于第一种即“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它“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这种

“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的嫉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对于后两种政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说：“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①马克思对这两种共产主义的批判很明确，它们一是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二是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毋庸讳言，无论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苏联，还是仍在前进中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说的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夺取政权来加速社会主义进程以减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无疑是列宁主义的历史创举。但是，不问历史条件，不去深刻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更不理睬需要的人的本性，以为简单地剥夺私有财产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甚至在仍然粗陋的水平上就宣布已经建成共产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不难理解，马克思对上述三种空想共产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于文艺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艺和文艺学，都要面对正确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和需要的人的本性的问题，包括私有财产与人的需要生成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和文艺学，不是也曾一度陷于对私有制的简单否定，而不能也不敢揭示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甚至对财产本身也加以鄙视吗？在文艺的领域里，本来应是需要的人的本性充分展现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20页。

审美地生成的空间,实际的情况却是人性本身最受钳制和束缚。我们即使知道“文学即人学”,又知道私有财产的人学意义,然而知道需要的人的本性并且能够加以张扬吗?对于那些表现了需要的人的本性的文艺作品,我们不是曾经持续不断地横蛮扫荡吗?在这样的思维场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往往阐释得极其褊狭和肤浅,使它失去了本来就有的广阔丰富的历史和人学内涵。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流行阐释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也远远未能反映出社会主义运动那壮丽而又深邃的人性景观,因而留下了令人叹惋的历史性遗憾。

在新的历史高度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

无论历史发展的自然性还是经济活动和文艺发展的自然性,都是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明确阐述的观点,其实质都在于肯定事物运动特别是人性生成的生态规律。然而十分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笛卡儿以来现代化运动的超越性批判精神被长期忽略了,社会主义只是被简单地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着干”,否认社会主义过程中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必然而重要的作用,甚至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混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于是,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和人性异化的批判以及关怀人性生成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思想,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漠视和否定,其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更不为人所注意,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文化人类学的引进来迂回地填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由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精神的生态学内涵长期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当生态问题凸显时,甚至还认为生态思想只需要从外部引进和从古代发掘,而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哲学的阐释视为跟风赶潮的牵强附会。马克思本来给了我们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的思想武器,却没有在历史进程中及时地发

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上述的事实应该足以说明,当我们在新的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时,理应在历史已经达到的新高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思想宝藏进行一次认真仔细的清点,深化对它的认识。何况,由于新时代的新语境的系统效应,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整体精神和学理内涵也一定会发生重点移位和意义更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和魅力。尽管世界在发生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历史之谜”依然存在,因此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依然光鲜。随着我们的视线超越狭隘的功利目标而对“历史之谜”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就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那种以为时移势易,马克思主义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现实条件和问题情境的变化,过去离我们很近的东西确实退远了,退到历史的深处去了,而过去不为我们所重视或者视而不见甚至公然拒绝的东西却离我们很近,凸显在历史的前沿了。

无论为了正确认识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都需要积极引进和创新。但是为了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首先努力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这个人类先进思想和智慧的宝库。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事实证明,只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胜利,而只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逐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重新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际。这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同时,也昭示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的距离。看看今天的“马克思学”在西方受到的重视,看看20世纪许多新潮哲学包括后现代思潮纷纷攀附马克思主义或向其吸取智慧的情景,看看发达国

家的环境和生态学者从马克思的学说寻求思想指导的严肃态度，我们理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的理解和阐释的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作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这应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义无反顾的责任。

返回原典文本，绝不是要把原典当作教条，而是对前人的思维成果的尊重，对已有的思想资源和创造智慧的尊重，也是对为之付出过沉重代价的历史经验的尊重。有这种尊重，有更深邃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心作支撑，我们才可能对走过的道路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才能在现在的路上走得更加清醒，更加自信，也更加稳重，更有成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返本”和“开新”

我们说的所谓“返本”和“开新”，不仅是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阐释与时俱进，同时也是为了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对于全面深刻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说，它的原典文本就是最基本的实际，只有拂开历史加诸其上的迷雾，努力把握它的整体和全局，才可能超越既有的局限，在切近原典本义的基础上联系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而走向开拓创新，实现对既有认识的超越。在这里，“返本”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真义的前提，“开新”则是现实发展的必需。

那么，我们所说的“返本”和“开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所谓“返本”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返回原典文本，第二是返回原典本义，第三是返回原典本来的整体形态。

返回原典文本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要重新清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文本本身。这里的原典原则上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的著作，因为只有他们的著作才能最真实准确地记录和表达他们的思想。过去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著作，在说明一些重要观点，比如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

论时,居然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结果只是以马克思之名讲述作者自己的观点——往往只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者宣讲的只是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在,这些文本已经空前完整地摆在面前,我们也有了从容面对这些文本的各种现实条件,需要的只是虚心诚实的态度和严格科学的精神。

返回原典文本是为了解读和把握蕴涵于文本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的本义。由于时过境迁和视界差异,还由于准确把握彼时彼地多层次(包括社会历史的和思想资料的)具体语境的困难,要完全理解其原生的本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凭借人类理性积累和创造的解读和阐释经验,尽量准确完整地接近其本义应该是可能的,也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的研究应该努力做到的。在这个层面上,清理过去对原典文本的某些误读,特别是在那些重要观点上的误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返回原典文本,探知原典本义,绝不能停留在对一些论断和观点的孤立的甄别和清理上,这里最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的思想进行整体审视的前提下,深入准确地把握其根本的学理形态和思维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只是革命的实践家,还是而且首先是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智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的学说既在现实实践中设置问题、吸取活力,也是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的大成和结晶。他们不着意于创建庞大的体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学说就没有整体上的内在联系,没有自身的逻辑系统。他们的具体观点,只有在这个思想整体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形态,还强调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对于实践论人类学的基础性地位,其用意就在这里。

显然,返回文本,返回本义,返回本来整体形态,这三个层面的“返本”是相互依存的。返回文本是基础,返回本义是目的,而返回

本来整体形态则是对返回本义的深度和高度上的要求。只有达到了这个深度和高度，“返本”才有意义，也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开新，实现对流行阐释的超越和与 21 世纪的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

所谓“开新”也有三个层次的意思：一是超越传统视界，开拓新的思维视野；二是超越流行阐释，开启新的阐释思路；三是超越历史局限，开展新的学理建设。

超越传统视界，就是要放开眼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全面纳入研究的视野之内，对原典文本中的思想观点进行细致的梳理，努力消除认知和理解上的盲点。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阐释，由于视界上的限制，不少重要的甚至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著作和观点都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对此，前面已有陈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超越传统视界之所以必要，不只是为了全面收罗和梳理原典的思想因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其整体形态和根本精神。流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形态的认识之所以狭隘，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现实实践的急迫需要对视界的限制，以至于把局部当成了整体，并由此造成若干原则性的偏离。

超越传统视界必然带来对流行阐释的超越。所谓超越流行阐释，首先就是要从新的整体形态和根本精神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具体观点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和整体精神的阐释，校正流行阐释中存在的片面的、肤浅的，甚至若干错误的认识和理解。这样的解读要求视界融合，要求理清来源和思想生成轨迹，要求坚持和纯熟运用从整体审视部分的阐释学原则。有上述三个“返回”作基础，就能够超越流行阐释而开启解读上的新思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阐释的与时俱进的新局面。

超越流行阐释无论多么重要，还只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真义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它解读的还只是原典文本本身。如果停留在这一步，就难免陷入所谓“本本主义”。返本是浩繁而艰辛的

工程，我们之所以从事这个工程不只是为了还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本来面目，更不是要展示和欣赏这番经学功夫，而是为了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伟大实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他们的学说以来，一个半世纪已经过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所当然应当与时俱进，向前发展。毫无疑问，这就必须超越原典思想的历史局限。这里说的历史局限，既有以发展了的世界为参照而显出的局限，也有马克思他们当时就存在的对于历史的认识上的一些局限。

上述三个层面的“开新”，因为有三个层面的“返回”为基础，它才成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超越，才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超越。

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进行新解读

由于阐释的整体效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精神和学理结构的新视域和新理解的建构，必然要引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很多重要观点的重新思考，从而突破和修正流行阐释中的一些误读曲解，同时还会发现一些过去未引起足够重视或根本就未予理睬，甚至有意抹杀的观点。这个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程，需要做浩繁而细致的工作。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粗略地审视一下可能出现的新认识。

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阐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学精神和人性关怀，这应当是新视域对流行理论阐释模式最重大的突破。在流行的观念中，并不是完全看不见人，但更多的情况是人被淹没在“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宏大范畴之中，或者只是生活和历史的扮演者、代言人和工具，或者只是生活和历史背景的投影，是诠释生活和历史本质的形象符号。在这种观念中，历史规律（有时还被人格化了）被作为绝对理念崇奉着，人只是历史规

律实现自己的工具。这种黑格尔化的历史观自然而然引申出黑格尔式的文艺观来。文艺被视为社会本质、历史理念甚至政治观念的图解,文艺学也基本上成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演绎,而文艺学在整体上应具有的“审美化人学”的精神和学理内涵被掩蔽,感性的、本色的和实践中的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被理性本质严格规范,作为人自身的目的的人和自身固有的丰富性以及人性生成的深邃内涵都消失了,而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更长期被视为异端。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应有的人文精神,因此淡薄而贫乏。

尽管哲学和文艺学都被黑格尔化了,我们却没有黑格尔本来的深邃。仅仅拿对典型人物的性格构成的阐释来看,也长期不如黑格尔所达到的水平,而总是在古典主义的圈子中徘徊。人们也曾企图从生命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求得帮助,却又陷入对人性认识和表现的另一种片面和肤浅,人的形象依然只是某种时髦理念的符号。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对人的本质及其生成的认识,包含而又超越了黑格尔,概括了现实实践和古希腊直到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易卜生等的文艺创作中表现人性境况和人性生成的成果,但是其丰富生动的内涵却在流行的阐释中简单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总是把人作为历史和艺术的中介。他们对人物的分析,固然少不了阶级性的揭示,却具有比阶级性更丰富的内容,并总是深入到一定的阶级性造成的人性处境和人性状态及对人性生成的意义这些特殊层面。马克思对古代希腊艺术永久魅力的人性根源的分析,他说济金根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珂德”,恩格斯对歌德的庸俗性和所谓“德国性格”的揭示,对“福斯泰夫式的背景”的概括,以及关于北欧小生产者“真正的人”的论断,如此等等,作为对特定人性形态和境况的个案考察,无不包含着深厚的人学内涵。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人类学的“普照的光”的照射下,这些内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并且闪射出新的光辉了。